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

吴光正　罗媛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

吴光正　罗媛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吴光正,罗媛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09934-0

Ⅰ.中… Ⅱ.①吴… ②罗… Ⅲ.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Ⅳ.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0880 号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责任编辑:李 琼 江俊伟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9.5 字数:586 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934-0 定价:8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贡献（代序）

吴光正

自从20世纪初林传甲等人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这一进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演进特点是从杂文学观走向纯文学观、从循环（退化）文学史观走向进化文学史观，后期的演进特点是从政治标准走向审美标准、从依赖外来理论走向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百年文学史书写与百年教育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进呈的《学堂章程折》以《钦定学堂章程》的名义颁布，史称壬寅学制。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份章程由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拟订，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各级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蒙养院、家庭教育等章程20份，史称癸卯学制。这些章程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规定各级各类学堂专业课或公共课或选修课必须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林传甲、窦警凡等人的文学史教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拟订《学校系统草案》；9月3日，北京政府公布《学校系统令》，此即《壬子学制》，后陆续补充修正，1913年8月重新公布，称《壬子癸丑学制》，沿用至1922年。这个学制规定学校教育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学本科设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1912年9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1912年9月29日，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2月2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2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1913 年 2 月 24 日，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1922 年 9 月 22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学制系统草案》进行审定和修改；11 月 1 日，大总统黎元洪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此后二十年沿用。这些制度规定大学文科文学门、中学和师范国文课必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不仅面对大学生而且面对中学生和师范生。由于民国采用欧美学制，所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文学史书写一般采用个人著述的方式，文学史的书写和教学以“与众不同”、“别出心裁”为尚，成就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一批杰出的个性鲜明的著作。

1950 年 5 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文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随后，教育部所组织的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拟定了中文系各门课的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文系必修课 13 门，《中国文学史》8 学分，还有《历代散文选》、《历代韵文选》与之相配。中国文学史课程目标为：“应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中国文学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其发展方向。”1950 年 8 月 2 日，政务院公布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批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指出，“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实行专门化”；《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还指出，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编订为新中国高等学校所适用的教材是实行课程改革的重要条件。1951 年 9 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京大学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肯定；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二十余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与会；1951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以改造思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就此拉开序幕。1952 年下半年至 1953 年，教育部依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这一举措本质上是用苏联的办学模式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并撤销、削弱教会大学和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学的建制和基础，使国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控制专业设置、招生名额以及师职的调配。从此，国家权力机构实现了对大学文学史书写和教学的完全控制，教学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乃至课时安排都被严格限制，文学史书写进入集体编撰的模式化书写和体制化书写时期，文学史的书写也成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一种博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的文学史书写出现了三大形态：一是在国家的指导下，一批专家集体编撰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教学大纲和文学史；二是一批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颇为吃力地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三是一批大学生在国家的鼓动下掀起了世界教材编写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史书写热潮。

“文革”结束后，高考得以恢复，高校中文系纷纷联合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以应教学之需。这些教材努力摆脱“左”的烙印，将文学史书写恢复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文学史书写进入高峰时期，适应普通高校、师范院校、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夜大学、老年大学、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自学考试等教学和培训要求的文学史教材层出不穷。这些中国文学史教材面孔基本相同，在质上并无突破，但其贡献却无法抹煞。80 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热潮和世纪之交的学术大反思掀起了文学史书写的大讨论，学术会议、专题论著纷纷涌现，教育部适时推出了一系列举措，90 年代中期开始迎来了文学史书写的质的突破。目前，这种突破还在进行中。与此同时，民国以来的文学史教材纷纷再版，一些老专家的讲义也被出版社推向市场，这也体现了温故知新以寻求突破的努力；高校通识课程、对外汉语教学课程等新的课程设置也催生了一批新的文学史教材。

1949 年后，港台地区的文学史书写依然迈着“民国式”的步伐前进，并在 70 年代形成文学史书写的高峰，其书写方式依然是民国

时期的个人著述，并且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的探寻。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大批优秀文学史教材一再被台湾出版社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版，其中刘大杰的文学史教材最受出版社青睐，该书也是最受台湾高校师生欢迎的教材。近年来，港台学者也纷纷对百年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龚鹏程还推出了旨在颠覆以往文学史书写观念的《中国文学史》。

百年来文学史书写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成功地参与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文学史这种学术样式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这一功能，在西学—中学（国学）张力结构中的中国文学史家对这一功能有着深刻的体认。文学史的撰写和出版之所以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大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学史作为国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武器：文学史的有无与好坏不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有无与好坏问题，而且是一个爱国与否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和国家存亡的问题。在这种理念下，掌握一国的文学史就成为了一国国民的基本素养。“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足以供学人之研究，而亦一般国民应有之知识”一类的表述就成了文学史著作中的习惯性表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注意挖掘文学史中的个性意识和平民精神，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文化建设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史书写成了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政治标准、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民间文学、现实主义成了指导文学史书写的灵魂，《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游国恩本文学史、中科院文学所本文学史成功地完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关注人本思想、关注文化心理结构，90年代兴起的编年体文学史甚至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关注与文学史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活动，世纪之交的文学史家倡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全民参与的性质。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中学、师范学校都必须学习中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利用国家机器推进了这一进程：统一了思想认识，编写了具有指导性质的教学大纲，并贯彻到高校中文系教学过程的每一个

环节中，大学文学史教育的政治性（前期）和人文性（后期）特征支配了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和阐释。

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是个史学大国，但是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却一直呈现出感悟式、零篇碎简式的特征。从20世纪初开始，章太炎启动了“文学”义界的阐述，文学史家在特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指导下确立了客观、求信的科学态度，并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进程、发展规律进行总体把握和逻辑阐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才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史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内容、中国文学史分期、中国文学史主流、中国文学史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史编写指导思想、中国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大讨论，最终在国家的指导下集体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从此规范了20世纪后半个时期的文学史书写进程。经过60余年的演练，文学史家辨析文学史史实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近年来的文学史书写在这个层面上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对史实的论述也用描述式代替了评判式，从而显得更加客观；逻辑阐释能力进一步加强，其观照视野从政治、经济走向美学和文化，并在一系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文学史的分期就不仅摆脱了日本文学史家的影响，而且摆脱了按王朝分期的做法，转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来分期。以作家为主（横切），以文体、流派、思潮为辅（竖切），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展开论述的编写体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90年代以来的编年体文学史充分吸收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有力地拓展了文学史的书写空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唤醒了文学史家的理论建构意识，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史学史、文学史哲学的探讨成为世纪之交的一道最为绚烂的风景线。文学史的书写一旦拥有了理论的翅膀，将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逐步深化了国人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的体认。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是体认民族传统的标尺。在西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的指引下，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放弃乃至批判广义的文学义界，转而认同、追捧狭义的文学义界，并进而建构纯文学史；纯文学史观不仅使得文学史从学术史中独立出来，而且使得文学史从文、笔并举中分离出来，从而大大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进化文学史观在纯文学的内部

减少了文学史的叙述对象，从而又一次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白话文学史观提升了白话文学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历史地位，却使文学史的疆域缩小了一半；纯文学史观、进化文学史观、白话文学史观还使得文学史的关注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考镜学术源流、探寻文学发展大势、分析文体演变，变而为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性灵文学史观不仅从论述焦点上进一步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而且开启了以主观的价值标准评价文学史的先河。从此，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论述话语和叙事逻辑；但是，《中国文学史》由于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本位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生成的文化语境，遮盖了文学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学自身的表达方式，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文学自身的文体构成和文体特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在努力平衡文学史的现实诉求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对民国文学史书写进行了反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拨乱反正的工作，使文学史书写恢复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80 年代的方法论热催生了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开拓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为学术界全面观照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奠定了基础；80 年代末掀起的重写文学史浪潮摒弃了政治标准，文学史书写得以在“文学本位”立场上展开，并在文化—人性的内在结构中寻求审美评判；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发现了外来理论切割糅合中国文学史的危险，更多的学者转而关注中国文学自身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并进而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历史进程，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编年研究、文学的地理研究、文学的文体研究、文学的媒介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文学的经济研究、文学的制度研究、文学的图像研究纷纷兴起。这些特征在袁行霈、章培恒、陈文新、杨义等的文学史著作中有显著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交的文学史家开始重新思考“文学”的定义，如袁行霈、章培恒都对文学进行了重新界定，陈文新甚至倡导“杂文学”观。这一思考和 20 世纪初的思考不同，前者是在中西对立的框架中展开，是西化的具体体现；后者是对西化弊端的反思，是学术走向民族化的标志。如果说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对中西文学史的巨大差异的体认是出于异质文化的碰撞，1949 年前后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文学史家对中西文学史巨大差异的麻木不仁体现了纯文学史观、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一统天下的话，那么世纪之交文学史家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的探寻则是一种理论的自觉。这意味着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有可能建构出自己的民族诗学，从而摆脱学术界长期依赖西方学术话语的命运。

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留下了440余部中国文学通史，这些通史的书写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年的文学史书写无一不受到特定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尤其是教育管理机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间的缺失也殊为明显。要而言之，约有四端。一曰学术独立意识的丧失。清末以讫民国，学与术、学术与政见的区分意识日渐浓厚，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都曾撰文加以论述，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是清末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独立意识的经典表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研究被纳入意识形态建构的轨道，《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不断出台的各种政策成了指导学术研究的不二指针，文学史家们或积极响应或被迫跟进；一大批青年教师青年学生甚至被鼓动起来向文学史专家们开火，并热火朝天地撰写着阐释意识形态的文学史。一曰科学精神的丧失。清末民国学者确立了文学史的信史时代，确立了无征不信的实证主义传统。在他们看来，任何论点的提出都需要拿出证据来。可惜的是，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这种科学精神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繁琐哲学的体现，文学史书写领域盛行的是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完全无视事实甚至曲解史实去营造符合政治斗争需要的所谓文学史。一曰民族本位意识的丧失。用以指导百年文学史书写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先后来自西方和苏联，这些理论给文学史家的现代学术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演练技法，推动了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理论均是在西方文学史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只适合于西方和苏联。在新旧交替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

①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清华大学消夏周刊》1929年第1期。

学者们面对东西文论的巨大差异，总是感到很难用西方的理念来梳理中国的文学史，因为中国的文学完全脱胎于经史子集，并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三四十年代还曾有朱自清、朱光潜、唐君毅、钱锺书、浦江清等学者对全盘西化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反省，但这种反省很快就被席卷全国的意识形态书写所掩盖。一曰理论建构能力的丧失。上述几种意识和精神的丧失，造成我们长期被各种各样的理论所误导，最后为了寻求突破不得不对这些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这样一种折腾不仅耗掉了许多文学史家的宝贵年华，而且导致了理论思维的贫困，使得文学史家无力超越盲点发表洞见。同时，上述几种意识和精神的丧失，造成我们在文学史史实的清理、传统文学文体特征的体认和民族诗学的建构方面留下了太多遗憾。

可喜的是，百年文学史书写毕竟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世纪之交的学术回顾和理论反思已经催生了无数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维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会有无数独具个性的文学史走进课堂，最受欢迎的文学史将会是由个人著述而成的文学史。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原以《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贡献》为题，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建国六十周年专号”。今增补部分内容，作为本书代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贡献（代序）…… 吴光正（1）
《中国文学史》自叙 …… 林传甲（1）
【点评】 ……（1）
《中国文学史》总论 …… 黄　人（4）
【点评】 ……（11）
文学总略 …… 章炳麟（14）
【点评】 ……（21）
《中国文学史纲》序例 …… 曾　毅（24）
【点评】 ……（28）
文学之定义 …… 谢无量（30）
【点评】 ……（36）
《白话文学史》引子 …… 胡　适（39）
【点评】 ……（42）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 傅斯年（44）
【点评】 ……（48）
《中国文学史讲稿》通论 …… 胡小石（51）
【点评】 ……（61）
《中国文学流变史》前论 …… 郑宾于（64）
【点评】 ……（71）
《十四朝文学史要略》叙论 …… 刘永济（73）
【点评】 ……（104）
《中国文学史》绪论 …… 钱基博（107）
【点评】 ……（114）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 …… 郑振铎（116）
【点评】 ……（124）
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 …… 陆侃如　冯沅君（127）
【点评】 ……（138）
《中国文学史》自序（存目） …… 林　庚（141）
【点评】 ……（141）
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存目） …… 刘大杰（143）
【点评】 ……（143）
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存目）
…… 余冠英（146）
【点评】 ……（146）
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存目） …… 游国恩（149）
【点评】 ……（149）
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 …… 罗宗强（152）
【点评】 ……（169）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 …… 章培恒　骆玉明（172）
【点评】 ……（180）
守正出新及其他（存目）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 …… 袁行霈（183）
【点评】 ……（183）
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 …… 董乃斌（186）
【点评】 ……（204）
文学史有限论 …… 徐公持（206）
【点评】 ……（227）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存目） …… 杨　义（229）
【点评】 ……（229）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 …… 傅璇琮　蒋　寅（231）
【点评】 ……（235）
《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 …… 陈文新（237）
【点评】 ……（240）

文学史的研究 …… 龚鹏程（244）
【点评】 ……（265）
中国文学史内容提要 …… 罗　媛（268）
政治、文化与学术的博弈
——百年文学史书写大事记 …… 吴光正（549）
后　记 …… 吴光正（618）

《中国文学史》自叙

林传甲

右目次凡十六篇，每篇十八章，总二百八十八章。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课。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然公共科文学每星期三小时，分类科文学每星期六小时，此半年之程度，实足与公共科全年程度相符。《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传甲更欲编辑《中国初等小学文典》、《中国高等小学文典》、《中国中等大文典》、《中国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课本。否则仍依《大学堂章程》编辑《历代名家论文要言》，亦巨制也。或曰《中国文学史》义取简约，古今一律。然国朝文学昌明，尤宜详备甄采，当别撰《国朝文学史》，以资考证。传甲不才，今置身著述之林，任事半年，所成止此。昔初编讲义时，曾弁短言，为授业豫定书。今已届一学期，爰辑期内所授课为报告书，由教务提调呈总监督察核焉。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朔侯官林传甲记。

——原载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排印本，1910 年。

【点　评】

《中国文学史》是林传甲 1904 年任教京师大学堂的讲义。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1898

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新政尽废，只有京师大学堂构想得以保存。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贴告示招生，1899年1月正式开学。这是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大学堂分为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预备科三级，其附设名目为仕学馆和师范馆。林传甲到任时，京师大学堂只有预备科以及附设之仕学馆、师范馆，林传甲担任的就是师范馆的“中国文学”教学任务。当时《奏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名为“优级师范科”。这个章程将课程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共科学科，其中的“中国文学”一科讲授时间为一年，讲授内容为“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一类为分类科学科，其中的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讲授时间为3年，讲授内容为“练习各体文学”。按规定，林传甲担任的是分类科“中国文学”的教学任务，但他发现自己的教授对象根本就没有学过公共科的“中国文学”的内容，于是只好补授相关内容。鉴于《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未规定“中国文学”的教法，林传甲于是按照大学专门分科——“中国文学专门科目”的规定来编写讲义。这种权宜做法本质上属于一种“越级”行为。

林传甲的文学史完全是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中国文学研究法”中“研究文学之要义”一款的规定编制的。章程规定研究文学之要义共四十一款，其前十六款曰：“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一古今音韵之变迁，一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一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乎世运之升降，一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一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一群经文体，一周秦传记杂史文体，一周秦诸子文体，一史汉三国四史文体，一诸史文体，一汉魏文体，一南北朝至隋文体，一唐宋至今文体，一骈散古合今分之渐，一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总计十六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

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林传甲的文学史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京师大学堂的教学规定。另外，林传甲还根据章程的提示参考了日本人笹川种郎写的《中国文学史》，但由于受学堂章程和自身素养的制约，他认为笹川种郎将小说、戏曲写入文学史是自乱体例。在他看来，此类曾经禁毁之淫书只能入风俗史。

林传甲 1904 年 5 月到京师大学堂就职，同年拣选广西知县，1906 年赴黑龙江，此后不再讲授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绝非其精心之作，但是他的文学史在民国年间发行量颇为可观，并被民国的文学史家目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而痛加批判。批判的理由就是林传甲不知文学为何物，将文学史写成了学术史。其实，林传甲的做法是当时的普遍做法。此前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后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均将经史子集写进了文学史。林传甲把“中国文学”当做“国民教育之本”是符合中西碰撞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理念的，其依傍传统史学体例撰写文学史也是此后文学史家的一贯做法，其讲述各体文学的发展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史意识。林著文学史是清理“文学”、“文学史”历史语义的重要资料，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吴光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